

中国近代翻译史嬗变轨迹中后殖民主义翻译思想的探究

罗 娜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省昆明市, 650000; 1151403383@qq.com)

摘 要: 中国自 1840 年起就进入了半殖民地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鸦片战争后到 19 世纪末的萌芽期、清末民初的拓展阶段, 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的繁荣时期。尽管“后殖民主义”一词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 关于后殖民时代相关的文学理论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便已开始, 这也是本文能够从中国近代探究后殖民主义翻译思想的逻辑基点。通过结合后殖民主义翻译演进的翻译策略, 分析近代翻译三个时期的活动, 探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本土与殖民文化的斗争、交流、创造的发展态势, 得出中国近代翻译跟随思想转型进程步伐, 翻译策略变化过程体现为从渐进性归化到最后发展为杂合性翻译的结论。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近代翻译; 翻译策略; 文化转型

引言

研究后殖民主义, 就离不开对历史的探究。中国自 1840 年起就进入了半殖民地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 中国的翻译迎来了第三次高潮。晚清以来的近代翻译, 大体经历两次鸦片战争至 19 世纪末的发轫期、清末民初的拓展、五四运动后的兴盛三个阶段, 彰显出官方对翻译活动的掌控力渐趋减弱、民间译介之力不断壮大、译著内容由自然科学逐渐扩展至人文社会科学、译法渐趋科学化、译者文化自觉意识逐步觉醒等特征[1]。不同翻译策略的选择, 体现出中国文化与殖民文化的斗争与融合, 同时也体现出译者文化自觉意识逐步觉醒与半殖民地深化及近代思想变化息息相关。本文将分别介绍后殖民主义翻译延伸出的翻译策略、探究近代三个时期翻译策略选择所映射出的中国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斗争、交流、交融创造的发展态势。

1 后殖民主义翻译下的翻译策略

然而, “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首次被正式提出是在印度学者斯皮瓦克于 1990 年所著的《后殖民批评家》中, 虽然“后殖民主义”一次诞生于九十年代, 关于后殖民时代相关文学理论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开始(米微微, 202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翻译有关后殖民的思想也早于其正式引入、应用于中国的时间, 也就是本文能够从中国近代探究后殖民主义翻译思想的逻辑基点。后殖民学者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态度反映到翻译活动中, 可分为三类。

一是以巴西“食人主义”翻译为代表的翻译策略, 这种观念建立在对欧洲文化的推崇之上, 坚信欧洲文化在各方面都优于本土文化, 并认为本土文化难以与西方主流文化竞争。因此, 这一立场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榜样, 进行学习和改进; 二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策略, 他反对译者使用归化翻译策略, 因为这种策略掩盖了译文中的文化混杂性。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作为标准来塑造外国文化作品的归化翻译, 实际上阻碍了文化间的平等交流; 三是由霍米·巴巴提出的“混杂性翻译”理论, 追求殖民文化的自我解构和土著文化的自我彰显, 对解殖民化有积极意义。三种翻译策略在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情况下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需要根据当时的翻译活动挖掘出背后所蕴含的翻译思想。

2 发轫期的探究

两次鸦片战争后,朝野士绅首先接触到西方发达的器物文明,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必先学习西方,而首先就是译介西方书籍。“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2]。考察此时期的翻译活动,无论是翻译机构的创立、译著内容的选取、翻译人才的培养还是翻译方法等,基本都是在官方主导下进行的,译介活动的目的亦是为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3],带有急功近利之特性。晚清政府作为异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积极地扶持和保护汉文化的发展,不认为西方的贸易体系和商业文化能够为中国带来财富和繁荣。从翻译活动及晚清政府态度上来看,此时翻译策略为归化,但这与巴西“食人主义”翻译所采用的归化并不完全一致。虽都是在汲取西方精华文化,但是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视角下的西方文化是被接受的,且被认为是优于本国文化的。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只是腐败、软弱、固步自封的晚清政府妥协的一步,映射到翻译层面,故表现出翻译策略是半妥协式的归化,即“英文之在吾国教育界,仅宜为一时救济之剂,不宜为恒久滋补之药”[4]。

3 拓展期的探索

随着前期翻译事业的艰辛起步,政局动荡、译介力量发生变化、留学归国等现实情况,在这个时期,国人翻译的内容逐渐从早期主要关注的西方科学技术,转向广泛翻译西方及日本的著作,涵盖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等多个领域。清末民初的两次文学运动,即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都对当时的翻译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有少数学者开始探索新译法,音译和义译之争也在此时浮现。张礼轩在1912年所著的《论译名》一文中指出,“译欧洲人名、地名尤不可类于中人、中地”,认为那种“强西人入我国籍,改从汉姓”的译法不可取。顾建新[5]探讨了清末译作的翻译方法和文学形式,指出在文学翻译的早期,由于译者的文学意识淡薄,白话文表达薄弱,翻译作品的受众以士大夫为主,倾向于归化、文言文和意译。而在文学革命爆发后,目的与读者以及翻译作品的文学形式和语言都转向大众化,并且随着译者文学意识的觉醒,直译和白话文表达也逐渐被广泛采用。胡翠娥[6]从小说人物形象的变化来考察清末译者的翻译思想。她注意到清末翻译作品中典型人物的归化翻译,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文学中存在的“洋鬼子”丑恶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认为当时的译者正逐渐忽视民族间的差异,转而开始关注中国和西方国家人物的相似之处,试图唤醒中国读者对西方小说人物的同理心。根据翻译活动的分析,可以得知清末民初的翻译策略仍然是以归化为主,但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度相比在晚清政府控制下更高及音译地位不断提高,有译者有转向认同西方文化的意识,这与国人文化自觉意识开始摆脱前期之幽闭状态而渐趋醒悟的态势息息相关。然而,器物文明及制度文明仍不能触动以儒家为核心价值观对中国思想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可以将两者结合来看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呈现渐进性妥协式的归化。

4 兴盛期的探索

“五四”后的翻译活动,是“翻译最盛行的时期”[7]。“五四”运动后,译法成为学术界激烈讨论的焦点之一。例如,有学者支持沿用“信达雅”原则,有人则认为与其追求信达不如优先顺畅,另一些人则提倡直译、硬译和顺译等方式。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完全突破了前两个时期,尤其是甲午战争前的单一、被动局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则直接出现了关于直译法、意译法的论战。鲁迅、英烈、李俊民、梁实秋、茅盾等学者就翻译的“信、达、顺”为基点展开激烈的讨论,“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8]的说法点明了翻译的使命和任务。这些讨论不仅反映出当时中国在翻译标准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彰显了译者文化自觉意识的全面觉醒。丁绪贤[9]指出,西方的科学书籍“迁地后难以适应”,科学在西方可能充满活力和吸引力,但到了中国却变得“死气沉沉、麻木不仁”,因此需要对西方著作进行“中国化”处理。鲁迅[10]则直接提出了“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的翻译命题,认为由于“中国的语言表达法不够精确”,翻译不仅是在引入新内容,

同时也是在引入新的表达方式。他主张将“异样的句法”——包括古代的、地方方言的、外国的句法——装入其中，以便最终据为己用。通过在译书中融入新的词汇和语法，可以丰富群众的语言表达。这些观点与先前两个时期所体现出的渐进归化策略还有所不同，而是一种杂合翻译，是异化策略的进化。乍一看像是妥协式的翻译策略，但却呈现出“在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11]。在殖民统治下的文化，土著文化不可避免地含有殖民文化的影响，两者相互渗透影响，文化在此空间下交流、斗争、创造。此时正值思想文化层面的转型时期，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文化的大交融。

5 结语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然而，中国依然受到西方文化殖民的影响，文化上的去殖民化进程尚未完全完成。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在中国近代翻译中的表现，是为了探究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能够实现不同文化之间和谐的交融与创造，进一步指导后殖民主义国家如何解殖民话、建立自己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利等问题。

另外，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但至今国内仍未形成以后殖民主义为源、结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翻译理论，且在翻译理论中缺失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将为中国翻译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 [1] 胡斌. 近代中国翻译嬗变轨迹的历史考察——以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为视角 [J]. 翻译界, 2022: 114-127.
- [2] 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C].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 [3] 郑振铎. 晚清文选 [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4] 沈步洲. 论今日中国教育界英文之位置 [J]. 中华教育界, 1913, (12): 97.
- [5] 顾建新.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方法与文学翻译文体的发展 [J]. 外语教学, 2004, (06): 50-54.
- [6] 胡翠娥. 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套话——兼论中国人对西方人认识的变迁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 (03): 86-91.
- [7] 陈光华. 论翻译 [J]. 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校刊, 1934: 6-8.
- [8] 赵景深. 论翻译 [J]. 读书月刊, 1931, 1(6): 14-18.
- [9] 丁绪贤. 科学书籍有“中国化”的必要 [J]. 晨报, 1925, (七周年纪念增刊): 205-208.
- [10] 鲁迅. 论翻译 [J]. 文学月报, 1932, 1(1): 9-13.
- [11] 赵稀方. 后殖民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